

西部文学的时空美学与叙事母题

白 浩

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空美学危机背景下,西部的空间意义得以凸显。滞缓的时间与边缘的空间是西部叙事产生的逻辑基础,催生出西部文学的原乡母题,时间的还乡指向于历史的寻根,而更彻底的还乡是在逻辑架构上回到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上来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回到自然与人维度,西部文学孕育出自然崇拜与生命意识等具体形态。回到人与人维度,西部文学对权力秩序与异化有穿透性认识,在对现代题材演绎中构筑起回归古典生存真相的反现代性叙事,在生命力主题与权力秩序的复合主题下,英雄悲剧、“殉”叙事成为其叙事典型。

关键词: 西部文学; 时空美学; 主题; 原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4) 06-0107-09

在文化全球化想象趋同时代,本土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的弱化发出文化危机警讯。丧失文化身份,精神世界就将变为丧失时间、丧失历史感的平面图,就会失掉自己的文化脊梁,而面对这种危机疗治的方法之一就是原乡逆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西部文学与整个 80 年代文学主潮有明显的错位感,它正因其后发性而更多地具有民族文化身份记忆的原点复归性,这一方面使其显得具有与东部时间、空间的落差感,另一方面却又具备了文化家园的真实性,故而在主流文学泡沫化之时显现出其真话题性。

一、当代文学的时空美学危机与西部空间意义

当现代社会极大地改变着时间、空间的自然存在形态之时,人们的时间-空间观念也就有了更大的主观随意性,在文学中赋予生存形态更多想象自由的同时,过度虚构也带来更加强烈的虚幻和不真实性,由此也增强了生存观念的虚无和荒诞感。相对之下,西部发展的滞缓则使其具有了时间空间的自然性和客观性,因而也赋予其精神家园构建的真实性和扎实感。在中国现当代以来文学的主潮中,西部文学更多是以它的缺席或曰边缘身份而存在的,边缘的价值往往会被主流价值所遮蔽,而边缘的价值也恰恰是在对主流价值体系进行检讨之时而得以凸显。因此对西部意义的挖掘是一种对相对价值的挖掘,先谈建构主流美学状态的美学坐标系和逻辑坐标系,便成为逻辑的先决。

在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谓现代性叙事体系中,时间神话是核心模式之一。时间和空间既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基本维度,以时空观念为基础而构建起世界观、人生观,发展出其基本行为方式。从仰观天文而演历法月令而有时间观,俯察地理而有空间观,时间空间观构筑起人行为活动的坐标系两轴,可谓天文地理共同推动了人文体系的生成。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以天干地支、农历节气所代表的循环论时间构建起一个封闭的认识论体系,五德终始、五方(东西南北中)、五时(春夏秋冬、季夏)到五行生克发展出世界构成与动力循环机制的哲学本体论,也构建起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价值自足叙事系统。然而,在近代西方以船坚炮利敲开国门时,

作者简介: 白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成都 610066)

也以进化论所支撑的公元纪年线性时间观击垮循环时间观,这也不断驱动着 20 世纪的革命叙事。对此唐晓渡曾论述道“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也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①现代人对时间的焦虑其实是对于进化论焦虑的表征,时间神话开启的正是以新纪元意识为标志的自我放逐主义革命叙事。在“走向未来”的线性叙事中,作为自然存在维度的时间转化为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由此意味着新的即是好的、进步的,旧的即是落后的,亦即需要抛弃的,因而需要以逐新意识来追赶时间。但时间追逐的射线尽头实乃永不可尽,这意味着时间的变动是永恒的,这场追逐也意味着对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固定都将迅疾转化为落后,故而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一个价值立场的固定和坚守亦将是归于落后的,进而也就意味着这场追逐的真相就是在价值世界中不断地自我放逐和自我摧毁,意味着无休止的抛弃。20 世纪的时间焦虑原本起源于诸如“亡国灭种”“失掉地球球籍”的空间焦虑,而对于时间无休止的追逐不停推进着对固定空间价值体系的摧毁,诸如五四的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新时期以来的后现代、全球化,20 世纪的政治革命总是与文化激进主义相互支撑相互激荡。时间神话与革命叙事以对未来追求的激进姿态而放逐自我,其所完成的价值抛弃已经足够深刻,而哲学的价值建构和情感的家园建设则仍在虚无与惶惑之中,这构成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美学危机。现代之人亦如古老的夸父逐日隐喻一样,人们终将渴死在这条追逐一维线性时间的道路上,对时间的焦虑使人轻忽了身处的空间位置,也忘记了那实质不过是追逐西方化价值系统的虚幻之日,真实留存的则只是路途中倒下的身形与“化为邓林”的愿望,它们屡屡作为历史的空间标刻留存下来而警示来者。

从发生机制上看,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本应当是相互依存的。在近代以前的循环论古典世界,空间相对于时间具有更强的阐释力,然而近代以来,按照“环球同此凉热”“人权无国界”等不同的政治价值表述,到全球化的经济文化格局,现代空间的区分变得十分虚弱,“历史终结论”的话语霸权更清晰地反衬着空间美学的弱化危机。其实回顾现代世界构架体系,曾经是有一些空间表述的,如政治的亚非拉、第三世界与欧风美雨、美帝苏修之类划分,亦如文化的东方西方、东洋西洋之划分,但这些空间划分是以“现代”这样的时间前提作为价值判断基座,即是屈从和依附于时间美学下的空间划分。在强势时间美学下,由时间价值标准引导着现代空间变迁,也意味着空间美学的一步步沦丧,落后空间的本土价值支点一步步沦丧,牵引弱势空间话语的典型表述便是从“失掉球籍”的焦虑到“走向世界”的拥抱姿势,政治经济所支撑的殖民空间转向于文化判断所支撑的后殖民空间。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现代后现代性对本土性的遮盖,世界性对民族性的遮蔽,换言之即是被赋予强价值判断的时间性对于古典化空间性的消解,故所谓的“现代”立体叙事其实更多只算得是个价值一维化的平面系叙事,这就是强势时间美学下全球主流空间的规训境遇。

在“现代化”时间美学的主潮中,也有来自本土空间的反抗个例。比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崛起,在本土化革命策略下提出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开始寻找能兼容进化时间美学的空间丰沛性美学体系,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美学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战略一起成长,它上接左翼运动思潮,下开新中国文艺一体化局面,演化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美学体系。这本被冀望是美学解放的一条捷径,但因为这个空间体系的存在价值本就是时间性的解放价值观所赋魅的,当解放神话向意识形态转换,继而演变成为一维化政治美学对于多维空间价值的压制。叙事体系里时间空间似乎一直都在,一直都是世界存在的阴阳基本二维,但时间为纵轴,空间为横轴,纵轴上的上下跳跃主导了曲线走向,空间横轴就变为背景轴,时间之阳也就压制了空间之阴。从空间解放叙事发起的反抗发展到以危机的方式结束并再度被重新阐释,也被重新纳入如“重回五四”之类时间叙事体系中去,由此也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从话语到技法、从经验到价值观的再次调适与同步。这种建构历史特定空间的努力再度被转化为时间追逐大势的注脚,甚至不时还

^① 唐晓渡 《时间神话的终结》,李复威编选 《世纪之交文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08 页。

被视为追逐时间的绊脚石，独立空间的身份认同一步步被掏空，时间狂奔而空间疲弱，“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秋》），这正是当代叙事陷入的时空美学危机。

现代文学学术界曾专注于对“‘现代’性”的讨论，企图将割裂空间的纷乱叙事归化于时间价值体系的一统。自然，“现代性”本就意味着一个时间维度的命名，而依照时间命名法则推进到后现代、后新时期时，“‘现代’性”的话语自大也成了“历史的中间物”，同时也意味着自我解构运动中新的合法性危机降临。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消解深度模式，正因此多维化空间意义的呈现与颠覆价值被解放出来。事实上，后现代哲学中已经发展出一支重视“后现代空间”的方面军，诸如列斐伏尔、詹姆逊等人就是其中代表，后现代地理学与空间美学都以空间发动向一维化时间的夺权。当然，不可否认，号称“后现代哲学空间转向”的命名里也仍然存在着以时间话语来叙述空间哲学的含混与矛盾，后现代理论自具的自我消解逻辑回环造成了进一步眩晕，而回归真实空间之中去书写简单的生存体验，回归到文学的生活源头，可能是更为可靠的路径。西部文学就是这样一块实实在在存在的领地，这是在现代性话语主流下，思想者更应该投视和珍重的文化空间领地。在充分意识到现代性时间神话统制下的主流危机与文化认同的虚无感的前提下，对空间的重新发掘才会更有意义，它能提供重回大地、重回生活、重回历史、重回民族文化精神的另一种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正是对于以往这种现代性霸权惯性的反抗，是发动空间探索美学对于时间霸权的反抗，而西部文学的美学探索也由此可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美学构建的一部分。

二、西部叙事的时空特征与原乡美学

在上述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叙事美学中，西部一直处于跟不上节拍的独立系统，它一方面体现为时间的滞后性、空间的异域感，另一方面则具有了冷眼旁观的机会。这也成为独立价值展现的机会，在前述主流美学危机显露之时，尤其具有参照对比与疗救的独特价值。

从时间上，与主流叙事的线性时间快节奏轮动相比，西部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即便不再可能是古典的循环时间，其变化也至少是缓慢的。这种慢吞吞的时间使其与前述的现代化时间追逐的主动焦虑不同，它具有了被时间拖拽、被时间驱撵着的落伍感，这在阿来小说从《尘埃落定》到《空山》那些藏乡村寨的命运变迁里便十分明显。但另一方面，西部这种慢吞吞的时间也使一切变动都已经过了多道防火墙的拦截和过滤，以致一切变动都似乎与己无关，因而其中的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咀嚼它的意义，也有充分的时间来体味历史记忆的家园感，来感慨，来总结，来旁观。这种缓慢甚至可以放大到叙事计时单位的巨大差异上，当东部、当主流的时间以年、以月、以日作为单位来计时，西部的时间单位则要以十年、百年，以一生、一代、一朝来计。历经这种缓慢而精细的咀嚼，在创作机制上，西部人有讷于言的笨拙，不出手是常态，而一出手则往往胸有成竹，所承载的往往是厚重沧桑的情感，是穿透岁月的大道哲学。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到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以这样的时间沉淀铺展开他们魅力的底色。而在美学形态上，如果说东部主流的时间是流，那么西部时间则是潭，流瞬息万变，潭则幽深静谧，深潭大鱼也不惊不诧；从居住空间来说，如果说东部主流的时间中不断上演三天拆两天建的形态翻新，那么西部的时间中则只有一所黄泥大坯的破屋，以不变应万变；东部叙事是在看一座座新房子楼起了楼塌了，瞬息万变眼花缭乱，而西部则是不变的黄泥小屋在看日起日落，在看时间如黄沙的浮起浮落，见惯不惊。凝聚到家园主题上，东部的家园感是异乡人、流浪者的怀乡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浮躁与轻扬，而西部的家园感则是在乡怀乡的深沉和痛苦。

特定的西部时空特征产生相应的生存意识，也产生相应的美学体现，滞缓的时间产生厚重的怀乡美学，边缘的弱势的空间指向于自在逍遥的地域美学。当西部的时间形态导向于坚固的历史意识、家园意识时，西部的空间则不断以边缘的地域文化而自得逍遥。这种边地逍遥的内里也弥散着边缘文化

的复杂悖论,原乡美学其实包含一种对于现实的拒绝状态,西部时间与空间美学均有其不得已的共同发生逻辑,即都具有对于主流的避闪和对于边缘的认领,在时间上无法占领当下的主流,于是向历史的深处发展,在空间上无法占领中东部的主流,于是向边地意识发展。边地意识是非主流的,其管控体系是山高皇帝远式的自在自为,对于这些自成体系的空间,古有夜郎自大、盆地意识等描述,而当代西部文学中则有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李娟“我的阿勒泰”式的诗意化生存空间构筑。

在身份的自我界定和互视体系里,如同有人梳理对比,北京人看别人都是外省人,上海人看别人都是乡下人,一个是政治权力优越感下的皇城意识,一个是经济优势下的洋场心态。如果仿照推导下去,那么西部,在封建王朝时代被视作戎狄蛮荒之地,在海洋文明时代则是内地人、外省人、乡下人的家园。从这样的身份认同出发,作为一种弱势空间的西部,经历外部认同的不断折射和反转,进而催化出混合形态的文化人格体系,其中自卑与自傲的复合并存就成为其典型悖论形态。此种意识的自觉在一些著作的标题中便可看出,如《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西部大荒中的盛典》《高地上的寓言》等。^①在面对现实自卑的同时,西部的抵抗策略往往会援引历史资源来强化自傲,坚执地域文化的独立自足性来维护其自傲。这种自傲往往导引西部文学走向寻根意识,他们需要作为文明始源之地的骄傲、需要历史中帝国中心的幻觉和地域独立的真实感来摆脱现实的边缘感。边缘的自足与自傲不光体现于精英文化意识,也体现于普通民众,他们从内在文化人格到外在行为体系都表现出特有的西部笨拙,同时又展现出特有的倔强,如在杨争光那里便是老旦站成一棵树,在贾平凹那里便是秦腔使秦人显得如此“二楞”。原乡型文化人格以封闭、深厚的不变根性来支撑流动现实里的尴尬生存。作为一个弱势空间,西部在等待着发现,大多状态下它是失语的,原乡型的文化自我意识也表现为在外在世界拖拽下的被动感。这种被动感包含复杂的成分元素,里面有来自地域、民间文化的非主流性对抗,也不排除落后者甚至受害者意识的常见构成成分,如封闭、自卑、顽固(倔强)等。原乡意识状态下西部文学有其自成系统的时间建构与空间建构,探寻西部文学的本土文化精魂,将是回归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上来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即回归世界构架的原始构成要素上来认识世界和自我。

三、自然原乡:生命与苦难

滞缓的时间与边缘的空间是西部叙事产生的逻辑基础,催生出西部文学的还乡母题。原乡有历史之乡,也有自然之乡。西部时间导向于历史的寻根叙事,而西部的空间之乡则将人拉扯回自然与人的原始关系,自然原乡成为西部叙事的起点。在还乡的复杂意蕴中,相较于时间空间叙事外在存在形态的还乡,更彻底更深层的是哲学的还乡,即对于人的哲学化生存的还原,也即是在逻辑架构上回到自然与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上来建构民族文化身份。鉴于时间滞后(或者说就是落后)的制约性,西部对于全国、全球空间意识体系尚无力建构,更专注于内部自然空间的存在。相对于东部的现代、后现代空间而言,西部更多地居于一个前现代空间之中,这里的人与自然更为密切和更为原始地相连。从自然原乡开始,西部主题的表现形态也就从自然崇拜与生命意识开始。

对自然的崇拜常见形态一方面是土地崇拜,另一方面则是泛神主义下的灵异崇拜。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土地对于西部原始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绝对贡献值,而西部人对于土地也具有绝对依赖性,在这种原始简单的双向交流不断反复和巩固中,土地崇拜自然而然生。当这种贡献和依赖的相互关联得以实现时,便是成功的狂喜来强化它,而当这种贡献和依赖因为天灾人祸而难以实现时,便是被剥夺的失败与沉痛感受来强化它。总之,无论成与败,土地崇拜都根深蒂固并反复得到强化。土地取得了神灵的地位,推而广之但凡能影响到土地生长的一切因素都可能获得相应

^① 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周政保《高地上的寓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的神灵地位,如山神河神长生天、司天气的雷公电母龙神,乃至树神花妖、狼怪狐鬼等等。此种逻辑的扩展便是万物有灵,由此理念推展为叙事形态,大而言之是自然崇拜,小而言之则具体呈现为叙事中牛鬼蛇神的灵异和巫鬼崇拜。贾平凹作品中的神神道道、牛鬼蛇神是这种文化背景的典型反映,在这种万物有灵的文化氛围中,也才能理解文学表述中近乎原始崇拜的“狼图腾”,才能理解骑手对马、额吉对草原的情感。

既然灵异在主宰人的命运,那么它也就能够轻易地以灾难来降罪和惩罚人的过错,这便是对自然灾害的解释和苦难意识的萌生,鉴于西部自然的无常和灾祸的深重,其苦难意识也就深刻和沉重。承载自然崇拜、生命意识底色的是厚重的苦难意识,苦难意识也搭起沟通自然崇拜与生命意识的逻辑之桥。苦难意识一方面向自然灵异崇拜献礼,但另一方面为了对抗苦难,不可避免地激发起自我的主体力量和生命意识,一者是自然灵异崇拜,一者是主体崇拜,这是苦难意识所滋育出的双头蛇。苦难的顺从-反抗双头蛇合体还孕育出泛神论这样独特的矛盾体。郭沫若诗歌中展现出惊世骇俗的生命原始伟力,对于“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式的天狗精神,以往一般是从五四时代精神最强音的角度来解释,却也往往陷入泛神与无神的阐释矛盾,而今以地域文化背景来阐释则可另辟蹊径,联系到郭沫若作为西部之子的文化背景时,他的泛神论矛盾即可迎刃而解,也才会更感慨他作为西部之子对于民族生命原动力的解放和极致张扬。“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又是偶像破坏者哟!”^①以自然神观之,便是泛神,便是偶像崇拜者;但以主体神观之,则是自我崇拜,是“我即神”,即为偶像破坏者,即为无神。在崇拜与征服的两极互生与震荡逻辑链里,自然神愈强,则主体神亦随之愈强;苦难意识愈强,而生命意识亦随之愈强。而当主体神不够强大时,苦难意识土壤里也滋育出宗教与道德意识来阐释和排解苦难,一个寄托于彼岸阐释救赎,一个寄托于世俗行为约束规范体系,它们共同来辅助现世生存中的灵魂平衡和秩序演进。

在西部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崇拜为逻辑起点,由土地崇拜到泛神-灵异崇拜,到苦难-生命意识,到宗教-道德意识,这层叠铺展开西部文学的价值空间系统。而西部空间中的情感状态,则由荒原山野自然中的天地人感应而共同产生生命感。人作为个体要面对空旷自然之伟力时产生强烈的孤独、绝望、寂寞等悲剧感。从情感的悲剧感继而到主体哲学建构的悲剧意识,这些一同构筑了西部叙事主体意识的楼层。

西部的空间原乡简化到真实的自然与人的原初关系上去,这是一个简化运动,这样的写作具有简单素朴的美,呈现为面对自然的悲剧感、痛感;而当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其生存体系与叙事体系离这些原始关系愈来愈远,更多地进入到人造的所谓高阶文明体系中去了,此时催发出的则是更为强烈的离乡的悲痛。因此,西部叙事的原始回归中,一种维度是熟悉的原始归乡感和简化的美,另一维度则伴随着现代文明批判的强烈失落感以及哲学与情感离家的痛感。面对自然的回家感使西部成为最具历史身份之地,无论白鹿精魂还是废弃之都,都成为历史的隐喻、母体精神的隐喻,因而西部写作一举手一投足间都具有文化写作的宏大建构,新边塞诗、黄土地诗、现代史诗等,都共同探寻民族文化身份的真相与表达。哲学还乡是令人心痛的,这是一种隐微然而更深沉的痛,人为什么要回家,漂泊无依的孤独与步入迷途的困窘催发形而上的天问。在主流文化迷失于后现代消费写作、快感写作、解构写作时,西部如同另一个平行宇宙一般令人惊诧,然而这却是一个熟悉的归家体验。这个对比体系是一个建构写作、一个古典写作,一个痛感写作,但其实也是现代人灵魂前行的一种方式。迷途知返的人是睿智和沧桑的,敢于灵魂回家的人也是勇敢的,西部写作因此而具有了文

①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全文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偶像破坏者哟!” (郭沫若 《沫若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6页)

化保守主义式的先锋性气质和探索意义。^①西部空间美学提醒我们自然仍然存在,一种反例式的先锋书写以生态文学的方式跃入新世纪文学眼帘,西部写作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代表,这就在于西部生存方式对于自然的高度依赖性使得他对自然生态危机的警觉是最为敏锐急迫和最为深沉的。正因为一旦自然被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所破坏,一旦失去自然,那西部的生存方式就将彻底一无所有一无所依,这既是现实物质生存的危机,也是西部文化的体系性危机。《环湖崩溃》《空山》等等都在展现着这种双重的危机,西部空间的危机与西部空间美学的危机并峙。

综合来看,自然的原乡具有丰富的表达层次,既是由西部时间空间构建体系所牵引出的空间还乡,也是人类哲学还乡的开启端,正因此,它是西部叙事的起点,也是人类生存哲学叙事的启动端。西部文学由此开始了从历史叙事向哲学叙事的转换。当然,分析可以如此分层,而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它们自然是复合一体的,因此,西部叙事意蕴层次的丰富更令人咀嚼不尽。

四、社会空间还原: 权力秩序与英雄壮歌

人的生存除了自然空间,更宽阔繁复的其实还是社会空间,天地人三才,终究要归于人的主体性。自然与人,人与人,既是故事的叙事形态构成,也是人哲学化生存的二维建构体系。尽管相比于现代化文明的生存方式,西部人与自然有着更多的生命接触以及更密切的依存性,但人毕竟仍然要生存于人的世界之中,人其实是比自然更为亲密的朋友,人也是比自然更为残忍和恐怖的敌人。除了自然原乡而外,西部世界的另一维度就是仍然要面对人所构成的权力秩序及生存挣扎,围绕权力的征服与反抗,英雄悲剧、“殉”叙事成为西部叙事的典型形态,而文明冲突、革命叙事则以其时代题材的丰富性来承载这些叙事的展开。

现代性叙事有丰富的演化形态,而驱动核心则在于进步神话的时代演进。进步神话的内核在于一个乌托邦许诺,比如爱情、和平、公平、正义、理想、解放等等,不同的合法性驱动构成了现代性以及时代性叙事演进阶层。时代迭进的每一次进步-幸福的卡里斯玛魅力宣讲如同塞壬的歌声驱使人们忘记生存的本相,西部叙事的清醒恰恰在于其闭目塞听的时代落后性。恰恰是西部文学,对复杂的现代性叙事神话保持了乡巴佬冷眼的哂笑,保存了当头棒喝的警醒——那就是对于权力秩序冷酷本相的警惕与揭穿。在这套古老叙事体系看来,在皇宫大院、都市繁华中有权力,在荒山野岭、贫瘠村落中也有权力,不论是诡异官场、飘零江湖,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权力,便有对人的支配,有对人的剥夺。人总是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权力秩序中,成为失去自我主体的异化之物,权力既是主体力量的实现,却也是主体力量受到束缚和戕害的源头,它甚至并不因为你的高贵或贫穷、喜好或厌倦而区别以待。权力本是为了实现人群共处的有效管理工具,然而当权力本身成为追求的目标时,权力便反过来成为扭曲和压迫本质力量的异化之物。世事可以变迁,朝代王权可以更替,痴男怨女可以起起落落,但权力秩序却是永恒的,这便是西部人在历史风沙的沧桑中,在看惯“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对世事万相的睿智和淡定。用陈忠实《白鹿原》的话来说,在白鹿原这块华夏族的母源之地上,大到党争、国争,小至族争、家斗、情变,统统不过是“翻鏊子”的权力游戏而已。这样的“祛魅”在任何时代的神圣面具下都显得反动,都显得可怕,因为这是来自民间的真相戳破,是对一切神圣之名的破坏和颠覆,对一切蛊惑之术的解蛊。在神圣之名的正义论证逻辑中,牺牲、奉献、战斗、镇压、保卫、打倒、剥夺都具有了神圣的正义性和必然性,然而放到权力秩序这个古老破旧然而最大的逻辑中,这些所谓神圣性的辩解都显得幼稚和可笑。

西部人保持着对于权力秩序的警惕,但却并不因为认清了这个逻辑就能避免祸害,就能化解其害,倒是恰恰相反,生存处境更加严峻。正因为西部资源的有限性,因为西部文明面貌的原始性,所

^① 李兴阳 《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以任何一场来自权力的剥夺都将是对最基本生存权利的损害乃至剥夺,这里的权力异化都将落实到更为赤裸裸的对生命、青春、情色、粮食、牲口等基本生存资源的掠夺和更为原始的食色掠夺上去,这样的掠夺是最彻底的剥夺和最无耻的损害。正是在西部贫瘠和原始的底色中,掠夺的底线更容易被打破,权力的残酷才会更清晰地显影,权力的复杂游戏才会被简单化还原,而由此产生的归纳和总结也才会如此的简单和真实。西部叙事对于权力的揭示既是深刻的,也是凄凉的。不可否认,人类文明史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制度的历史进步,或者德行、功名、富贵等个体神圣之名的变化所推动,那么在权力秩序下“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一个对人类真相的凄凉认知,这个权力认识也是对文明进步论的反动;如果说神圣之名进化到民主、共和、阶级、解放、自由等现代性叙事,那么,这个权力揭示也便可能构成反现代性的叙事。以现代性神话的神圣之名角度来看,这样的叙事简直就像一个自以为是的乡巴佬那可怕的自信一样,就像他们对火车、轮船,对电灯电话的理解一样可笑。故而,西部叙事的保守性无可否认,对此,如李建军对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的批判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也不能据此就否定西部叙事的价值和意义,如同鲁迅把册子翻过来看到满篇的“吃人”一样,西部叙事包含的毕竟是对历史幻象的穿透性认识,是对“人”生存本相的还原,也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真相的还原,这是西部叙事的永恒性价值高点,当人们热衷于现代性神话的发烧呓语胡话时,这样乡巴佬的视角也能提供难得的清醒剂,这也是西部叙事所能提供的独特现实批判意义。

权力秩序是对生命的戕害,这是对权力最严厉的否定,反过来,从叙述逻辑来看,西部权力叙事母题中这种否定的申诉也正构成其生命叙事的基本价值申扬。从生长逻辑看,生命力主题既孕育于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也来自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然的残酷和人之权力的残暴同样激发出人生命力的反抗,自然力的伟岸和人之情感的博大,也同样培育出人生命力的发育和壮硕。在西部生命的存在形态上,无论自然的残酷还是伟岸,也无论人之权力的残暴还是人之情感的博大深邃,它们都以更原始的面貌而更为直接和不加掩饰地展现,由此产生的生命力对比也更为鲜明,被压垮者显得更为委顿,而未被压垮者则更为粗犷强悍。征服与反抗,构成西部权力叙事的基本形态,生命力则是它的终极旨归,这种生命力在农耕世界中更多以韧性特质来表达,在游牧世界中则更多以刚烈和强悍特质来表达,前者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黑娃,后者如《西去的骑手》《甲光》,它们在迥然有异的文明风貌中都以生命力主题的强悍而震撼人心。

在西部世界中,生命力主题与权力秩序主题相聚合,以共同的反现代性价值推动人们回归到古典生存的真相中去,并由此而熔铸出独特的英雄叙事形态,这成为西部文学中最光彩也最丰富的部分。以西部生命力的超越性价值观之,生命力强悍的便是英雄,这样的英雄并不因为阵营的不同、成败的不同而贬值,并不因为现代性神圣之名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而歪曲。与成王败寇的庸俗功利主义评价不同,西部英雄不问来路也不问去处,西部人崇拜纯粹的英雄,崇拜强悍的生命力,对真正的英雄不打折扣。故而,鹿黑娃是匪是兵都是英雄,杂司令马仲英这个“白匪”也是响当当的好汉,而被打败的红军团长伍长工同样是英雄。西部崇拜的是现实英雄,更是哲学化的英雄。在独特的西部英雄美学形态里,在结局与过程之间,西部叙事崇拜英雄的生命过程,英雄之生轰轰烈烈,英雄之死同样荡气回肠,阳刚与壮美的美学感染和哲学价值在悲剧中更加淋漓酣畅。对于一向阴柔气占上风的中华传统儒道主流文化来说,这样的西部英雄美学、生命美学无疑是阳刚一极的难得平衡和补充。

英雄生命叙事的表现形态一方面是外在体能、技能之超乎常人,另一方面则是主观意志力的顽强和坚韧超乎常人。相较而言,从表面形态转到内在精神的升华才是真英雄之路,与苦难现实搏斗的英雄意志才是英雄哲学的内核。在故事层面,力拔山兮气盖世与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却常常要面对坚硬如铁的权力秩序世界,也要面对英雄生不逢时的“时不利兮雅不逝”与“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惨淡结局,而卑微如路遥笔下孙少平孙少安那样的底层人物,以顽强的意志力抗争着权力秩序世界,同样英雄气十足,却也更要常态化地面对惨淡的人生局面。固然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长

使英雄泪满襟的英雄气短却形成更令人震撼的悲剧美。在美学特质上,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炽热相融合,铸就英雄叙事的反差张力。这种悲剧之美魅力的双重性来自一方面是英雄追求过程的执着,另一方面则是英雄毁灭结局的冲击,这种双重性力量的集中扭结便是西部英雄叙事中独特的“殉”的故事。“殉”有殉教、殉道、殉情,道有替天行道之正义道、愚忠之孝义道、博爱之仁义道,也有西部民间隐史《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的教义之道。情则有爱情、友情,亦有亲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殉道殉情故事正是对于信仰的极度追求,对于主体精神力的极度张扬,以及对于障碍之物的彻底否定批判。“殉”叙事的内在核心体现于过于崇高的目标、过于强悍执着的追求和过于凄凉的结局,三者综合构成的是英雄肉体毁灭和英雄意志长存间的对比,这是对真善美的极致表现,是对真善美既彻底颂扬却又彻底怀疑的撕裂与交战。英雄崇拜的极限竟然是英雄悲剧,二者的融合就是“殉”叙事。“殉”叙事并非单向度的颂扬,它也蕴含着更为丰富和深沉的哲学魅力,它在肯定主体精神力的同时却也无可避免地埋藏着对英雄毁灭和牺牲价值的深切怀疑,这怀疑意味着叙事者对于英雄局限性的深刻理解、同情,以及超越。这是最为古典的叙事模式,但却是常说常新,它讲述着古典英雄们如何生存于变动的文明世界中,也不断地反诘着古典英雄们的牺牲真的是有价值的吗,其价值标准真的是恰当的吗,英雄们的毁灭悲剧如何推动现实的进步从而避免毁灭的重演呢?但西部叙事因为对于英雄的过度钟爱和对古典世界的过于沉迷,也往往可能陷入对古典英雄情结的固步自封而不能提供解答的绳索。放置到现代性价值叙事中,这些反诘所具有的摧毁力往往赋予西部英雄叙事“最后一个”的绝响色彩。甚至于这类叙事超越于虚构而外溢到生活真实中,故事的叙事者本人在现实生存中也常常具有了同其笔下英雄毁灭一样的“殉”的悲情色彩,如柳青、路遥所代表的古典情怀和写作方式本身就成为既令人敬佩却也饱受质疑的对象。

前已论及西部文学具有穿透历史迷雾和纠正现代性偏差的价值,但并非否定其丰富形态,也并非指其决然不具备现代元素,西部文学毕竟是生存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具备现代题材和思想元素这是自然的,譬如对英雄悲剧的价值反思就指向于现代性观念的引入和现代叙事的展开。一般来说,英雄悲剧的题材背景以文明冲突和革命叙事为两种常见类型。文明冲突包括愚昧-文明、落后-进步、边地-城市等一些常见类型,而革命叙事则常见苦难-救星、漂泊-寻找等类型。正因为西部文化格局的僵化性和超稳定性,故而新旧事物间、不同文化力量代表间的冲突都是严酷的,这种严酷的根源主要在于传统和保守力量的过于强大。前已论及,以西部的生命力价值观而言,并不以价值立场有别而否认强悍生命力的伟大,所以,在西部叙事中,保守力量并非如一般主流叙事所表述的那样总是腐朽没落的,恰恰相反,他们或许仍然具备强悍的生命力,譬如《桑那高地的太阳》的“老爷子”同样具有强悍的意志力和高明的智慧。固然作为知青中优秀代表的谢平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他的遭遇有着英雄末路的荒诞,他屈从于骆驼圈子生存规则也有着文明屈从于野蛮的悲痛,这里塑造的是新生事物中英雄的受难,这是一种悲剧英雄。而另一方面,作为“老爷子”来说,如果排除其价值立场的落后而言,那他也是个响当当的英雄,而在历史发展规律的铁流下,老爷子们的没落是必然的,故而老爷子表现愈是强势,其没落便愈是可悲,这是另一种悲剧英雄,即没落事物中英雄的衰老和落伍。在世界文学画廊,巴尔扎克为老式贵族们的美德与高贵唱起挽歌,在西部英雄叙事中,新生英雄与老英雄也共同撑开丰富的张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从叙述角度来看,对文明冲突和革命叙事的展开与审视其实一般都是通过外来者讲述的,故而它们其实也是一个迁移文学的主题,外来者视角与本土视角的转换带来了对于西部封闭世界既欣赏又批判的情感复杂性和价值理性复杂性,比如说史铁生对《遥远的清平湾》美好事物的缅怀,又比如韩少功对《西望茅草地》张种田的怜惜,都有这种情感与理性分裂复合的反复发酵,多少微量元素已难以尽述,最终酿出的是深沉醉人又具神秘色彩的醇酒。此外,这种外来视角也可能启发和转化为西部本土者的视角,因为西部毕竟也是要向前发展的,而内部也包含着这种进步的内生动力源,文明冲突和革命叙事正是西部本土精魂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西部生命叙事与英雄叙事中,性别角色的划分也带来独特的西部风韵。如果说前述主要是以强悍坚韧的男性叙事来撑起西部叙事的主天空,那么,不可否认,在西部文学的性别叙事中,女性形象要少得多,篇幅要小得多,其光彩亦要逊色得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形象的缺失。阳极则易亏,刚极则易折,共工之触不周山,刑天之舞干戚,男性叙事总是不免走向世界的破坏和毁灭,西部叙事里也隐含着内在的失衡危机。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西部并不多的女性形象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承载着平衡阴阳、拯救世界的功能。西部的女性形象主要有女儿性与母性两种体现,清纯如水的女儿性固然并不缺乏,但更具光彩的则是厚德载物的母性。^① 这些伟大的母性,从过程看,她们忍受着男儿们的任性和胡闹,宽容地看待他们的成败、抚慰男人们的伤痕血迹,又如母老虎一样勇敢泼辣地跳出来捍卫男人们的尊严,她们承担着男人们的拳头也收拾着男人们离去的烂摊子;从情感和价值来看,她们成为男人们情感的归宿地和家园的象征,成为西部不竭生命力的源泉。在叙事结构功能上,铁骨总被柔情征服,铁血又总被柔肠所沸腾,男人在女人身边合上眼睛沉沉睡去,有时醒来,有时永不醒来,而女人则永远都是那样不惊不诧,叙事的对比和平衡同样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和丰富。正如张贤亮的马缨花、陈忠实的朱先生夫人、张承志的老额吉,这些母性形象是滋育万物、承载万物的地母化身,是真善美的见证者,也是西部美学的偶像。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母性叙事,西部世界才是平衡的世界,西部的叙事才能永恒流传。

总之,在对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朴素回归中,西部文学拉开了与主流文学的时间、空间对比度,也拓展出情感和生存哲学的多维价值空间,自然崇拜、生命崇拜这些基本母题演绎出丰富的故事形态,也以宏阔醇厚的西部美学体系大大深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底蕴。

(责任编辑:周维东 郭鹏程)

^① 李遇春分析说“这些伟大的女性与其说是娇柔万端得让曹植心荡神怡的、女儿性十足的‘洛神’,倒不如说是厚德载物般让韩信感恩不已的、母性无边的‘漂母’。”参见李遇春《拯救灵魂的忏悔录——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分析》,《小说评论》2001年第3期。

He Qingfang's "Coming Out of the World" and "Entering the World":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New Literature Writers

Song Jianhua

Summary: As a famous writer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e Qifang's early poetr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aoism, and his attitude of "coming out of the world" was very obvious.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roke out, the predominant national sentiment prompted him to change from "coming out of the world" to "entering the world"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hinese nation's anti-fascist war, and finally embarking on the road of revolution. This is the "He Qifang phenomenon" which has been drawing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In fact, this is not only a comm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change of national situation is only the external factor that leads to the change of thought of He Qifang and other new literature writers, whil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the internal factor that has shaped their life choice. Therefore, an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e Qifang phenomenon" is superficial, as it cannot enter the soul of this phenomenon.

The men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has always been in free switch between Confucian and Taoist thoughts, seeking to place themselves in an invincible psychological balance. Yan Yuan, a philosopher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revealed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in his poetic lines: "In peacetime they talk about the nature of heart/mind idly with folded arms, but in crisis they would not hesitate to die for their kings." Here "talking about the nature of heart/mind" refers to the Daoist mentality of "coming out of the world", and "to die for their kings" refers to the Confucian mentality of "entering the world". This free change between the two mentalities enabled them to calmly deal with various complicated social situations. The essence of "He Qifang phenomenon" is that although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ccepted the western humanistic spirit, they still 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hen class and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have not developed to the point of absolute intensification, they can relax, do not care about state affairs, enjoy themselves, chant poems and pursue dreams. When the aggressors trample on their own homeland, they would share the same hatred, use their pen as the gu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righteousness even at the cost of their lives. Therefore, "He Qifang phenomenon" is not so simple as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change, but the modern expression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personality. If we ignore the inherent restrain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or Chinese literati and only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He Qifang phenomenon" from the sociological dimension, we will get nothing except a lot of metaphysical nonsense.

Key words: He Qifang; Coming out of the world; Entering the world;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ultural personality

The Space-Time Aesthetics and Narrative Motifs of China's Western Literature

Bai Hao

Summary: In the modernity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imeliness is endowed with strong value judgment, and the dominant temporal aesthetics dismantles the classical spatial value. This has led to the covering of the localization b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and the covering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by the global narratives.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merges as a counteraction against the entrenched discourse power of modernity, representing a resistance by spatial aesthetics multiplicity to the monopolization of the temporal discourse aesthetic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crisis in the space-time aesthe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ern space is highlighted, and the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is thereb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The sluggish time and marginal space constitute the logical basis for Western narrative, giving rise to the original

hometown motif of China's Western literature. The temporal form of the West is directed towards a firm sense of historical root-searching and home consciousness, generating a profound nostalgic aesthetics. The marginal and disadvantaged Western space points towards a carefree regional aesthetics.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 native culture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volves not only a return to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but also a reverting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e-human and human-human, that i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world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both self and environment. The Western hometown pulls people back to the prim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s. In this dimension, Western literature takes nature worship and life consciousnes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spreading the value space sy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land worship to pantheism-supernatural worship, to suffering-life consciousness, and to religion-mo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human-human dimension, Western literature has a penetrating understanding of power order and alienation while crafting anti-modern narratives that seek truth rooted in classical existence amidst contemporary themes. In the composite theme of vitality and power hierarchies, heroic tragedy and "martyrdom" narratives emerge as typical forms of Western narrative. The internal core of the "martyrdom" narrative is manifested in overly lofty goals, tenacious pursuits, and desolate ending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constitut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destruction of hero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heroic willpower. Aesthetically speaking, the cold realism and passionate idealism are fused together, creating a contrasting tension in the heroic narrative. The value reflection on heroic tragedies points to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oncepts and the unfolding of modern narratives, while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and revolutionary narratives carry out this modernity narratives through the richness of their them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na's Western Literature; Space-time aesthetics; Motifs; Theme; Archetype

A Study on Kang You-wei's Turning to the USA for Helping Rescue Emperor Guang-xu

Li Yongsheng

Summary: Empress Dowager Ci-xi launched the 1898 coup to deprive Emperor Guang-xu of his power and suppress the reformers. Kang You-wei fled abroad but he never gave up his political ideal to reform China. From Sept.1898 to Nov. 1908, Kang You-wei endeavored to restore the power of Emperor Guang-xu. To achieve his goal Kang turned to the UK, Japan and the US for help. This thesis focuses on Kang's efforts to entreat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help.

From the 1898 coup to the 1900 incident, Kang mainly relied on the UK and Japan to help him, but he ask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help twice via letters. After the 1898 coup Kang fled to Hongkong via Shanghai and soon reached Japan from Hongkong. On October 31, 1898, Kang ordered his followers to send Chinese letters to the ministers of the Powers in Beijing, entreating them for help. Such a letter was received by American minister Conger who translated it into English and sent it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uring the 1900 incident Empress Dowager Ci-xi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Powers. It seem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Kang to get help from the Powers to restore the emperor into power. While Kang, who was living in Penang of Strait Settlements, mainly asked British government for help, but he also sent letters respectively to the Powers for the second time entreating them again for help restoring Guang-xu into throne. The letter reached American minister Conger, but the US government did not respond to Kang's request.

After 1901, Kang stopped asking the UK and Japan for help but he turned to the US twice. Kang went to America in February 1905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et with President Roosevelt two times in June. On September 14, 1905, Kang, who was then in New York, wrote a letter to Roosevelt to ask for his help. Kang suggested two approaches to Roosevelt. One approach is to ask Conger's wife to persuade Princess Rong-shou to ask Empress Dowager Ci-xi to return the ruling power to Emperor Guang-Xu. The other approach is that the US could collaborate with British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to force Empress Dowager Ci-xi to abandon the ruling power. On hearing the news that Emperor Guang-xu was dying, and worrying that Yuan Shi-kai would poison Emperor Guang-xu, Kang sent three telegraphs on November 15 and 16 to President Roosevelt, asking him to prevent Yuan Shi-kai from poisoning Emperor Guang-xu.

Kang Yu-wei's action to entreat the Powers for help by military or diplomatic measures divorced from the re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hip and did not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 US government needed to